

油画《开国大典》4次修改内幕

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大加称赞的油画《开国大典》，作为现代油画的经典作品，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这幅凝结了人民热爱新中国情感的具有纪念碑式意义的精品画作，其命运却异常坎坷。它与共和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在一次次运动中，它数次被迫修改，其作者董希文也因种种政治原因而饱受磨难。



董希文作《开国大典》（资料图片）



董希文 生于浙江绍兴，曾在苏州艺专、杭州艺专等地学习过，后又到西南、西北地区学习创作。他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画作多次得到徐悲鸿等众多著名画家的好评。他擅长革命题材创作、人物画的本领是行内知名的。

受命创作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党庆节日，中央决定举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党庆画展。这为历史巨作《开国大典》油画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经过几个月的征集准备，画家们为这次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于是，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有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知名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接到任务后，通过对开国大

典的电影、摄影、图片资料的研究，认为资料里的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不在一个场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采用一种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大胆的艺术处理手法，按自己的理解去选择画面构图。

董希文先画了一张草图，并经常揣着这张画稿，不耻下问地征求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的意见。草图上，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一个是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外，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里，而右边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有失平衡，但却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另外一个按正常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

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广场显得更为开阔。为了慎重起见，董希文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

1952年，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一间普通的房间里，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独立创作出了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

画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背后站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们胸前佩戴着代表的红签，脸上呈现出聆听着《公报》的激动心情。广场上红旗如林、绚丽多彩，整齐的队伍和严肃的标兵显得庄严、隆重、热烈。城楼上左面的一排大红柱子及大红宫灯，崭新

的紫红地毯、盛开的菊花，朵朵的白云和天空中翱翔的白鸽，无不象征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与和平。远处升起的五星红旗，标志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封建制度的结束，也是我们古老民族的新生。

《开国大典》在色彩的构思和运用上大胆地运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基调，用蓝、棕、绿调和。他的女儿董一沙介绍说：“父亲画天安门城楼上的地毯时，为了增强地毯的质感，在颜料中掺上锯木的木屑和沙子，增强了地毯的质感。画中张澜长袍上的褶皱看上去是特意熨平折好，专等到庆典才穿上去的。还有汉白玉的栏杆故意没有画得很白，而是偏黄，是为了体现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

广泛影响

《开国大典》作为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作为歌颂新中国成立的世纪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它问世后，《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人民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并收入当时的中小学课本。

《开国大典》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称赞。一天，周

扬等领导带董希文去中南海汇报，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当他们一起看到《开国大典》时，几位国家领导人都很兴奋。毛泽东点头赞道：“是大国，是中国。”他还自豪地说：“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开国大典》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徐悲鸿作

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正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

氛。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自从《开国大典》问世，这幅洋溢神州风采的油画，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第一篇章。

多次修改

作为一幅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主题的政治绘画作品，人们欣赏《开国大典》，正是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新世纪。但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画中人物的命运就决定了此画的命运，同时又牵涉到画家的命运。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开国大典》这幅画被迫数次修改，这在绘画史上是罕见的。其作者董希文因这幅作品而声名鹊起、名扬全国，也因这幅作品而在“文革”中遭到打击迫害，饱受政治磨难。

《开国大典》完成后才三年，就发生了“高饶事件”。作为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此后又被开除出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

典》，将画面上的高岗形象抹掉。《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因为高岗站在前排最边上，为了不使画面损坏，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的画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这个修改工程就更难了，因为不是简单地去掉一个人，而且要另外补上一个人，还要牵动旁边的人。更为难的是，董希文此时已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

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很遗憾，等到刘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之日，董希文已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亲自在《开国大典》上恢复刘少奇的形象了。

1972年，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而筹办纪念美展，把董希文从干校调回北京，要求他重画此画，而此时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文革”后期，又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来的政治局委员）。这时董希文已去世，就找到了靳尚谊，靳尚谊不忍修改原作，就重新复制了一幅，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刘少奇的平

反，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但董希文的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实之词的连累，作了很大的改动，难以恢复原貌，董希文家属也不同意在原作上再改动。博物馆只好委托著名画家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复制品），而原作则存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据《文史春秋》